



从语言性到一致性

——论伽达默尔的一致性政治思想

付志勇

摘要: 在《真理与方法》中,语言被赋予一种实践的特征,它不是指称消极地反映世界,而是标志着和世界的实践关系并构成世界。语言是通过公共生活才得以可能的,语言的前提条件就是作为基础的一致性。一致性是固有存在的,而不是人们所创造出来的。现代大众社会过分强调对专门化的崇拜,导致了人与人之间在地位上的巨大差别以及社会权力的不均。我们的公共生活过于强调差异和争端、竞争和怀疑,而忽略了那种我们真正共同拥有和将我们联合在一起的一致性。只有沉思潜在于人类生活规范的深层次的一致性才能克服这些缺点,只有在解释学的语言图景中、在永不终止的平等对话中,人类生活的一致性才能真正建立起来。

关键词: 语言性;一致性;差异性;友谊;他者

“一致性”(Solidarität)是伽达默尔后期才明确提出来的概念,但是在前期出版的代表作《真理与方法》第I卷中,这一概念已经被间接地涉及到了,尤其体现在他关于语言性的表述中。随着伽达默尔后期对政治问题的日益关注,一致性概念被明确地提出来。从语言性到一致性,既表明了伽达默尔前后期思想的延续性和进一步深化,又凸显出他对社会现实的关注,从而,这一转变可以看成是伽达默尔政治哲学思想的发展。

一、语言性:谈话与共同意见的达成

贯穿《真理与方法》第I卷的有多个主题,其中的重点之一就是对话语言性的讨论。伽达默尔反对那种把语言看成是一种工具、可以随心所欲支配的观点,而是认为就像我们在世界之中存在那样,我们也是在语言之中存在的。“在语言之中世界向我们敞开。在语言之中我们和其他的‘存在者’相遇、和自己相遇。与我们相遇的一切存在都在语言之中被理解。”^①所以,我们的一切经验都是以语言作为媒介,语言性具有最广泛的普遍性,它将人类世界统一起来。这就是伽达默尔所谓的人类世界经验的语言性。

伽达默尔还认为,能够进行理解的存在都是语言,语言和理解是合二为一的,理解就是在语言上取得相互一致,理解的过程是一种语言过程。必须通过谈话,我们才能达成共同的语言或者说达到相互了解。什么是谈话?伽达默尔对这个我们每天都在进行着的人类基本活动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认为,谈话不是由谈话的双方或者一方主导的活动,在谈话中,谈话者处于被主导的地位。根据我们的日常经验,尽管在谈话之前我们做了充分的准备,在谈话过程中我们将谈话尽可能地控制在我们想要的轨道上,但是我们依然无法

^① 丸山高司:《伽达默尔:视野融合》,刘文柱等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19页。

确切知道谈话的最终结果是什么以及谈话能否达到我们的预期。事实上,我们往往会经历很多失败的谈话,有时候不仅无法通过谈话达成相互了解,甚至可能引起更大的误解。所以,与其说我们“进行”一场谈话,不如说我们“陷入”一场谈话,我们无法支配谈话的内容和方向,好像谈话拥有其自己的精神,会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

不能相互了解并取得一致意见的谈话,显然不是一个成功的谈话,或者说不是真正的谈话。真正的谈话具有两方面的特征:第一,要设身处地地考虑对方的观点,把自己置身于对方的立场,以便于理解对方。这就意味着要努力使陌生的观点对自己产生作用。第二,要把对方的观点置于我们的思考中,用自己的观点去判断对方的观点,从而把握对方观点的实际根据。“如果在谈话中这种情况对谈话双方都发生,而且参加谈话的每一方都能在坚持自己理由的同时也考虑对方的根据,这样我们就能在一种不引人注意的、但并非任意的观点交换中(我们称之为意见交换)达到一种共同语言和共同意见。”^①

我们可以把谈话双方的观点看成是谈话者各自的视域,把谈话看成是视域融合的过程。在谈话中我们运用的是语言,而语言通常是基于某一个处境或者视域而被言说的,但是这个视域不是孤立的,而为其他相关的视域所限制和影响,所以在视域融合的过程中,新的意义会不断产生出来。“解释是一种‘视域融合’,即解释者自身的历史视角和被解释的作者的作者的历史视角的融合。经验的内在历史性保证了每一个立场和视角的独特性。”^②伽达默尔将视域定义为我们活动于其中并且与我们一起活动的东西,表明了视域的社会性特征。因为诸视域必然和其他视域相关,所以它们就经常处于“再商谈”(re-negotiation)的过程中。“视域融合的思想表明了调和与妥协的可能性,表明了我们在与他人遭遇时的那种不确定性。同时,它也表明了不断拓宽视域的可能性。”^③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视域融合不仅是人类经验和理解的拓展,更是人们共同生活范围的扩大。

视域融合依赖于伽达默尔所说的“问答逻辑”。问答逻辑是一种理解历史文本的实践过程,解释者要从某个问题出发,去发现隐藏在文本背后的答案。问题本身预设了回答,而回答同时又开启了新的问题,从而这种问答的模式不断推进,这就是伽达默尔的问答逻辑。通过这种非正式的语言的逻辑,不断拓展的一致性就出现了。并且,这一过程也可以应用于文化领域,解释学的对话使跨文化交流和理解得以可能。解释学的过程是普遍的,所有的理解,不管是什么样的文化背景,都或多或少地参与到了永不休止的解释学循环之中。

在《真理与方法》第I卷中,语言被赋予一种实践的特征,它不是作为指称消极地反映世界,而是标志着和世界的实践关系,并构成世界。语言的这样一种特征是通过公共网络和达成共识来实现的,因而在哲学解释学的语言—世界图景中,公共性和社会性被赋予优先的地位。语言是通过公共生活才得以可能的,我们甚至可以说语言的前提条件就是作为基础的一致性。这种在《真理与方法》第I卷中提出的语言观,为伽达默尔后期提出一致性概念奠定了哲学基础。

二、“一致性”理论对专家社会的批判

海德格尔于1923年在弗莱堡开过关于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的研讨班,探讨实践智慧及其与技术的区别等问题,伽达默尔曾参加并深受其影响。伦理学和政治学是亚里士多德实践哲学的两个方面,这里的实践不能从科学层次上,而应该在人的生活整体层次上来理解,解释学的实践哲学正是建构在这一理论的基础之上。伽达默尔认为理解的条件在于解释者身处的传统之中,这就是所谓的解释学处境,一切政治和伦理行为都是在解释学处境中发生的。对伽达默尔而言,解释学处境标志着这样一种方式,在其中我们被抛入历史中或一系列历史事件中,对此我们无法使之开始也无法使之结束,而是必须以某种方式继续。我们必须总是以某种方式行动,因为不行动本身就是行动的一种形式。而为了决定如何行动,我们必须理解我们自身和我们在其中发现自身的历史事件,于是这里又涉及了解释学

①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第1卷,洪汉鼎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544页。

②Stanley Rosen, *Hermeneutics as Politics*,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p. 165.

③Chris Lawn & Niall Keane, *The Gadamer Dictionary*, London: Continuum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Group, 2011, p. 120.

循环的问题。伽达默尔认为,解释者只有通过一系列的对前理解和前判断的解释才能更好地理解文本。解释者的心灵绝不是一块白板,而是为期待或者意义模型、临时准则所充满,它们共同构成了对各种文本的解释中的前假设,这就是解释学循环。这种解释学循环不是对解释者的关闭,而是对文本的他在性和他者的系统地开放。伽达默尔认为,解释学循环构成了我们的社会和历史现实的一部分。

在论及哲学解释学反思的范围和作用时,伽达默尔指出,解释学的任务绝不仅仅局限于理论上的探讨,而是“充分揭示解释学的所有领域,指出它对我们关于世界的整个理解的根本意义以及它对这种理解展示其自身的各种形式的重要意义”^①,这些形式包括人际的交往、对社会的控制、社会个体的个人经验、人与社会打交道的方法等等。他甚至认为,对事物的认识并不是理解的真正目的,理解的真正目的在于“对事物达成一致性的共识。一致性的理解比正确的观看更具有优先地位”^②。在晚年和杜特的谈话中,伽达默尔明确使用了“一致性”概念来表达他对这些现实问题的关注。伽达默尔并没有明确给出“一致性”的定义,根据他在使用这一概念时的语境,可以给它下一个简单的界定:“一致性,指的是共同享有的生活(shared life)。”^③

人们总是受制于既定的道德习俗和社会体制,一直以来试图挣脱其束缚,但是如新保守主义所言,体制可以减轻人们的负担,而摆脱体制就意味着人们的生活会因此而变得艰难。但是,伽达默尔认为,要解决这一困境,靠简单地回归到体制中是行不通的,我们应该自己寻找出路,“这出路就是理解,就是一致性。我认为我们今日政治最当要的任务即在于如何使我们对于真正的一致性有一总体的意识。”^④伽达默尔认为,一致性是固有存在的,而不是为人们所创造出来的。人们总是试图形成公共意见,使本已存在的一致性在媒介中适当地呈现出来。在谈及欧洲中心论的思维模式以及贫穷国家向发达国家的人口涌入时,伽达默尔指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隔绝已经不再可能,这是一致性的必然,只有通过经济的帮助和发展,这种人口涌入现象才会停止。甚至反原子能运动也是一种对真正的一致性的表达。但是一致性绝不是指某些单独的因素,而是指的共同体,我们只能在所有的事物中经历到一致性,一致性不仅存在于具体的事情即社会事务中,也存在于精神科学之中。

伽达默尔认为,我们只能在舆论文化的广大基础上保护和进一步发展一致性,这种舆论文化不接受人们有意的调控,而是靠着自身力量而形成的。所谓的舆论文化,就是允许不同的观点存在,公众可以对自己关心的问题进行公开讨论。对于波普尔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中对乌托邦主义的批判,伽达默尔不以为然。伽达默尔认为,乌托邦是古希腊文学的一种表现形式,它采取隐晦曲折的方式进行现实批判,而不必设计出实际可行的方案。乌托邦是一种想象力的表现,它能够有效地推动反思,因而不应该扼杀乌托邦的幻想。容许乌托邦体现了舆论文化的自由,这是对一致性的保护。

与舆论文化相对立的是“专家社会”。专家社会同时就是一个职员的社会,这是指在科学、技术、经济、政治、管理等形式中,每一个人都必须保证“自己是自己所是的东西:一个为了机器平稳运行而被安在某个位置上的东西”^⑤。专家社会的本质是技术统治社会,即在社会中把公民相互之间做事和表达意愿的权力转交给各种各样的专家,由他们代替公民做出实际的、政治的和经济的决定。专家是各门具体科学的代表,这些具体科学越来越把自己看成是为了规划社会和控制社会的目的而制定出来的科学,赋予自己无限的职能,企图从外部决定每个个体和每个团体的整个生活。从而,这些自诩为照料社会机器运行的专家自己就显示出其方法的异化并且偏离其所属的社会。

现代文化生活过分强调对专门化的崇拜,专门化导致了人与人之间在地位上的巨大差别以及社会权力的不均。对专家的顺从意味着对公众意见的压制,这将导致民众对公共事务的冷漠和无动于衷,社会中将会有越来越少的人做决定,越来越多的人在机器的某个部位上工作,从而导致实践堕落为技术以

①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夏镇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第18页。

②Gadamer, *Dialogue and Dialectic*. Trans. P. Christopher Smith.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0, p. 115.

③Chris Lawn & Niall Keane, *The Gadamer Dictionary*, p. 132.

④伽达默尔:《解释学、美学、实践哲学:伽达默尔与杜特对谈录》,金慧敏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70页。

⑤伽达默尔:《科学时代的理性》,薛华等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第65页。

及社会非理性。伽达默尔认为,这种对公众舆论的形成加以技术化的方法是非常危险的,因为专家的能力和诚实意识不足以满足人们的期望,而且,出于某种利益需要,公众舆论很容易被有意识地引向某个方向。除此之外,专家社会还会引起等级分化和社会权力的不公,导致官僚社会的出现。在伽达默尔看来,解释学反思有助于我们避免这一情形。只有通过解释学语言图景的对话理论,才能摆脱专家社会对潜在的一致性的遮蔽。“确实,在家庭、朋友以及人类一致性中,用其他的力量——尤其是公众的力量,来限制这种对自然的统治范围是非常重要的,如此人们才得以达成理解和被理解。理解通常首先意味着:我现在明白你的意思了!在这么说的时侯,我并没有说你是对的或者你是错的。但是只有当我们直截了当的说我们理解了别人,不管是政治情况还是文本,我们才能够和其他人充分地沟通。”^①

从20世纪开始,技术知识已经从对自然力量的掌控扩展为对社会生活的掌控,这是我们文明危机的标志。在技术统治社会的情形下,人们往往求助于专家,指望他们在各个领域中做出决定。伽达默尔认为,这是一种危险的倾向。我们需要一种具有人性化的理性,即社会理性。传统哲学中的理性概念通常指的是一种高级的认识能力,它能够对我们该如何思考和行动作出普遍的判断,但是这种理性却忽视了我们总是在具体的历史和社会环境中做出决定的,而社会理性则考虑到了具体的历史和社会环境的影响。社会理性要思考的问题是,在以技术发展为特点的文明中,人造的东西是如何规定了我们的生活,以及我们在对技术的依赖中是怎样失去了与自己的活动能力相关的自由。实践的一般指向是引导人们并使其在一致性中行动,这里的一致性充当着所有社会理性的条件和基础。对伽达默尔来说,实践的重要性不仅仅在于改变世界,还在于对社会理性的影响。实践不仅仅指的是人们自由实施自己的计划的活动,还与他人有关,在实践的活动中,我们与他人是处于一致性中的,彼此共同决定着共同的利益。

三、友谊与一致性

在1999年名为《友谊和一致性》的文章中,伽达默尔对一致性进行了最为集中的讨论。他认为,在友谊和一致性之间存在着一种张力,这种张力可以磨锐我们的思想,点明我们的任务。伽达默尔提出了友谊的三个重要特征,在他看来,这些特征意味着一致性的实现。

首先,友谊“构成了安居于那种一切都是可信赖的家庭”^②。朋友之间彼此拥有着共同体并相互忠诚,就像共处于一个家庭当中。友谊涉及到的不仅是与他人处理好各种关系,更是朋友彼此之间结合在一起,并拥有共同的生活。友谊的第二个重要特征表明了对差异和他者的认同。伽达默尔引用了柏拉图《吕西斯篇》中苏格拉底与两个男孩的对话。苏格拉底提出了一个问题:友谊是否基于两个人的条件相当?或者说,人们是否在与自己条件相当的人中间来择友?事实上并非如此,因为我们总是在朋友身上发现令我们钦佩和爱慕的地方,这恰恰表明了我们和朋友之间的差异性。所以,伽达默尔反对那种观点,即朋友们之所以会拥有共同生活,是因为他们之间的同一性或他们彼此分享着亲密性或相似性。朋友之间不是彼此相同的,也不是我们用自己的形象重塑他人,而是要承认和欣赏他人的独特性。

于是友谊的第三个重要特征出现了:由于朋友们拥有的共同体和共同生活,所以他们能够彼此向对方敞开;由于他们的差异性,他们能够帮助彼此达到对自身的新的理解。我们的朋友是那些藉由与我们的差异,我们能够向之展现自身、并能帮助我们向自己展现的人。朋友总是能够对我们的言行举止提出不同的看法,这就使我们能够对自己进行不同的理解,同样,我们对朋友也是如此。以这种方式,友谊允诺了相互的自我理解和洞察。

我们总是说我们是和朋友、和他者联系在一起的,那么什么是联系?伽达默尔认为,古希腊词汇“*Philautia*”为我们揭示了我們之所以联系在一起的关键因素。“*Philautia*”的意思是爱自己,这就引出了“自爱”(Selbstliebe)的概念,在自爱中人们发现了彼此结合在一起的真正基础。自爱并不意味着只

① Bruce Krajewski(eds.), *Gadamer's Repercussions: Reconsidering Philosophical Hermeneutics*. Oakland: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3, p. 9.

② Hans-Georg Gadamer, “Freundschaft und Solidarität” in *Hermeneutische Entwürfe. Vorträge und Aufsätze*. Tübingen: Mohr Siebeck, 2000, p. 58.

关心自己的利益而忽视了他者,自爱是对自己的友谊,真正的自爱意味着人与自己保持一致,如果一个人要成为他人的朋友、恋人、商业伙伴或者同事,他就必须要与自己取得一致,否则他就会在与他人的共同生活中感到陌生与困难。所以友谊首先就是人们与自己一致,只有如此,才能与他人联系在一起。友谊的这些特征表明了共同生活、差异性和他者的重要性,以及由此而发展起来的相互的自我理解。对伽达默尔来说,友谊指的是与他人一起共处在共同体中,朋友之间对彼此的不同看法,使对方增加了对自我的理解。这种友谊的结果是使得人们对自身的理解更加丰富。他认为这些特征也适用于一致性。

首先,像友谊一样,一致性涉及到与他人共处于家庭中的意思。我们共有的事业和环境揭示了我们所一起拥有的共同生活。在一致性中,我们会发现我们归属于其中的共同体,就像我们共处于家庭中一样。其次,尽管有共同生活,一致性也涉及到差异性。虽然我们是在共同的事业和环境中与他人共处于一致性,但这并不代表要和这些他人相同。在全世界范围内的环境保护运动中,参与的人们并没有相同的种族、国家和宗教信仰等等,但是他们可以跨越这些差异,在共同的事业目标中形成一致性的共识。第三,一致性关系到人们相互的洞察。就朋友帮助我们理解我们作为个体的独特性而言,友谊是一种自我启示,同样,一致性也是一种相似的启示。在工业革命及其影响下所形成的现代生活方式中,大规模的官僚化社会以及复杂的经济将个体还原为数字,并用技术处理它们,例如在现代的医院中,病人甚至只有号码,没有名字。伽达默尔认为,这种情况雅斯贝尔斯早在1930年就已经赋予了准确的名称,后者称我们的时代为“匿名责任的时代”^①。在这个时代中人们如何能够维护和发展自身的幸福?伽达默尔相信,一致性能够通过揭示人们的特殊性并恢复他们的独特性,使人们从这种命运中解脱出来。因为我们在一致性中拥有的共同生活,我们能够达到彼此认识,和我们共处于一致性中的这些人对我们不是匿名的,我们对他们也不是匿名的。就像我们在友谊中所做的一样,我们相互揭示,从而,我们能从无区分的群体中作为对彼此而言独特的个体区分出来。

所以,一致性具有三个重要的特征,即致力于发现共同体、允许差异性和克服匿名性。一致性的特征并不是基于共同的人性或人类本质,而是基于人类共处于其中的生活形式。与他人共处于一致性中,就是我们将他人或是我们被他人从大众存在的匿名中凸出出来。我们不是将他们看成是类似我们的存在,而是将他们看成是带有具体差异性的他者,这些差异性使他们能够从无差别的同质性中凸出出来。

一致性是被发现而不是被创造,我们已经是邻人、同胞或者共同关注环境危机的人,这种真正的一致性必须被意识到。就一致性与他者的关系而言,他者的独特性对我们来说总是已经在那里了,只是被现代大众社会给遮蔽了。我们必须有意识地为彼此揭示这些我们已经归属于其中的一致性的共同体,我们发现我们已经与他者共处于一个大家需要共同努力的家庭中。我们总是与他者联结在一起的,如果我们想要揭示和理解我们自己,我们就要承认他者的差异性。

事实上,伽达默尔在《真理与方法》(第I卷)关于我一你关系的表述中已经强调了共同体、他者和相互理解。他在三个层次上考察我一你关系。第一个层次是将我设想为不受他者影响的、独立的个体,而将他者理解为要处理的知觉对象;第二个层次是将他者通过移情作用理解为你,但这个你并不具有独立于我的同一性。“首先他人被理解为知觉对象,然后这个对象通过移情作用‘变成’你。”^②我对你的这种移情式的理解,使我能够在某些方面比你更加了解你自己。但是这种理解是从我的立场反思性地预先给定的,他者还是被消融在我里面的。在第三层次中,他者真正成为他者,这才是伽达默尔所主张的我一你关系。在我一你关系中,你既不是我要处理的对象,也不是为我所给定的,而是我和你处在对话之中。我们承认你和我之间存在着差异,相互聆听对方,并承认对方所说的与我们原先的预期或所知道的是不同的。所以,就像友谊和一致性一样,我一你关系有助于产生新的认识。

四、一致性与差异性:德里达的挑战

伽达默尔认为,理解不光发生在我们遭遇文本的时候,还涉及到人与人、人与世界的普遍关系,理解

^① Hans-Georg Gadamer, *Freundschaft und Solidarität*, p. 56.

^② 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第1卷,第357页。

承担着我们人与他者的共同生活,并且通过拥有语言和共同对话起作用。在考察我与他者的关系时,必然会涉及到差异性或者说陌生性的问题,因为他者之所以为他者,就在于他是与我们有差异的。人们虽然可以通过语言达到对彼此的理解和沟通,但语言既无法穿透他者的全部奥秘,也无法把自己完全通过语言表达出来。德里达就是这种差异性理论的支持者。在对伽达默尔的批评中,德里达提出了理解或意义的“断裂”思想:理解是无法达成的,发生在理解和解释中的是意义的断裂,他者并不是语言可以通达的,理解的诸条件如语言、对话等对此无能为力,即“对所有中介作用的扬弃”^①。这种“断裂”思想正是对差异性的绝对化,也是对一致性的批评。

伽达默尔清楚地看到,一致性和差异性之间具有张力,而不是相互排斥。当德里达强调差异性时,他是站在对话的开端,而不是对话的终点,正是由于差异性的存在,我们才需要对话,对话在差异性那里开始。在对德里达的回应中,伽达默尔否定了这种主张人与人之间存在绝对的差异性的观点,他认为,语言在本质上就是通往他者的,每一次对话和书写都是发生在语言中的理解事件。尽管在理解中我们一再遭遇到界限,彼此答非所问、甚至自我混淆,但是意义断裂的可能性仅仅发生在已经存在认同的程度上。并且,如果说语言在交往之中会带来种种理解的障碍的话,解释学的目的就是要消除这种障碍。要让人们对所有事物都达到理解和完全一致的意见是不可能的,但是人们可以通过永无止境的对话去接近理解的一致性。绝对的差异性和断裂是不可能的,所有的人类一致性和社会稳定性都假设了这一点。伽达默尔是通过回到一致性来反对差异性的,在不断地对话中,我们达到视域融合的目的,从而差异性被克服,一致性被加强。

为了理解,我们要看向自身之外,看向他人。这将引导我们看向和他人的一致性,使我们能够发现我们与他人的共同性。解释学的中心动机即是要“克服疏异性,认同陌生东西”^②。如果我们没有学会解释学的美德,即没有认识到理解他人的至关重要性、作为整体的人类的一致性和我们共同的生活和生存的可能性,充满危机的现代社会将无法寻找到出路。所以说,一致性反映了聆听他人、和他人一起解决共同的问题以及参与到共同的追求中的意愿。

解释学的一致性概念强调的是在对话中和他人的合作,反映了聆听他人、和他人一起解决共同的问题以及参与到共同的事业中的愿景。我们的公共生活过于强调差异和争端、竞争和怀疑,而忽略了那种我们真正共同拥有和将我们联合在一起的东西,即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一致性。对差异性的觉知和敏感导致了人们好斗的性格以及对对抗的偏好,只有沉思潜在于人类生活规范的深层次的一致性才能克服这一点,只有在解释学的语言图景中、在永不终止的平等对话中,人类社会的一致性才能真正建立起来。在这个意义上,伽达默尔的解释学可以导向“更多的民主和更少的极权主义维度,它所允诺的批评形式是民主商议的解释的形式”^③。

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第I卷)中的语言观凸出了语言和世界的实践关系而不是指称关系,这不仅有力地驳斥了哲学的主观主义传统,而且赋予公共性和社会性以优先地位,为后期提出一致性的观点奠定了基础。一致性本身就存在于人们共同的社会事务之中,我们应该在舆论文化的广大基础上保护和发展一致性。在现代大众社会对专门化、差异和竞争过分强调的背景下,专家社会遮蔽了人类生活潜在的一致性,并导致人与人之间对冲突和对立的偏好。只有在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对话中、在解释学的友谊图景中,去发现我们一起拥有的共同生活并承认彼此的差异性,以达到对自我和他者的新的洞察,才能克服这些时代的缺陷,人类生活的一致性才能真正建立起来。

●作者地址:付志勇,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Email:88dolong@163.com。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14CZX042)

●责任编辑:涂文迁

①伽达默尔、德里达:《德法之争:伽达默尔与德里达的对话》,孙周兴、孙善春编译,同济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43页。

②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第2卷,洪汉鼎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356页。

③Robert J. Dostal.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Gadam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 79.